

即认出，这就是他的儿子拉蒙·米尔卡达雅！

至此，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莫尔奈尔是西班牙人，他的真实姓名叫拉蒙！

拉蒙，西班牙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时期曾在共产党军队中任政治教官……随后，通过拉蒙的父亲，警方又查明了拉蒙的幕后指使人——拉蒙的母亲卡莉达雅。

卡莉达雅 1892 年生于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后来与其父母双亲回西班牙巴塞罗那定居，18 岁时嫁给巴卜罗·米尔卡达雅。两家门当户对。但年轻貌美又多才多艺的卡莉达雅却不甘心过这种平凡安定的家庭生活，极高的政治热情使她很快投身到西班牙国内革命运动中去了。此后，她又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家庭决裂，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受到了克里姆林宫方面共产国际的重视。

生长在这样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家庭里，拉蒙从小就热爱母亲，嫌弃父亲的守旧。从学生时代起，拉蒙就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西班牙内战时，母子二人并肩战斗，并成为反对佛朗哥政府的主要战将。

当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后，卡莉达雅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派，秘密潜入墨西哥，负责调查托洛茨基的一举一动。此后，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发展，斯大林决定尽快除掉托洛茨基，并委派苏联内务部考托夫将军负责此事。共同的使命使卡莉达雅与考托夫结成挚友，进而又发展成热恋关系，并公开

同居。1940 年 5 月 24 日对托洛茨基住宅的突袭，就是考托夫和卡莉达雅的一次失败“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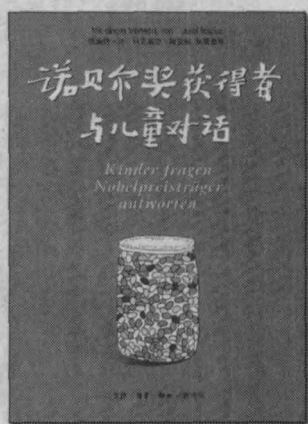
那次暗杀失败后，斯大林极为震怒。为了向克里姆林宫交一份成功答卷，他们再次进行密谋，并选定了拉蒙去执行这一任务。

按考托夫和卡莉达雅的计划，拉蒙在砍死托洛茨基之后，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悄悄撤离。当时托洛茨基住宅外正停着两辆引擎已发动的轿车，两辆车内分别坐着卡莉达雅和考托夫。拉蒙出来后，立即就上车飞驰而去。另外，假如拉蒙行刺后被发觉，两辆车则迅速冲进去营救，而拉蒙则持枪外冲——这正是当时拉蒙口袋里放手枪的原因。接应成功之后，他们将立即赶往机场，机场已为他们配备了一架直升机……

但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当卡莉达雅和考托夫听到警报声后，墨西哥警方卫队已立即冲了进去。因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拉蒙肯定是冲不出来了。于是他们才驾车而去。拉蒙在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被捕的结局，肯定也是他们所料不及的。

整个谋杀事件到此真相大白。拉蒙在狱中一直坚称他是比利时人以及是莫尔奈尔的原因，主要就是因幕后指使人之一就是他的母亲，他只能咬紧牙关拒不供认实情！

（摘自《超级刺客：20 世纪政治谋杀追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12.00。社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邮编：100081）



什么

是

政治？

□ [以]西蒙·佩雷斯



西蒙·佩雷斯，1923 年 8 月 15 日出生。以色列政治家。因为他的中东政策和基茨夏

克·拉宾及亚西尔·阿拉法特共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他建立佩雷斯和平研究所,并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祖国以色列的和平进程。2001年3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先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如果政治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清楚而严肃的回答:如果什么时候人们不能够就他们的政治目标达成一致共识,那么什么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是用政治言论而是用武器进行战斗——为了土地,为了金钱和财富,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将来谁拥有支配权。人们能够为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牺牲一切,既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能牺牲别人的、挡住他们去路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人居间调解的话。居间调解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它不可以失败。

因为如果调解失败,那么这很快便涉及生与死,涉及战争与和平。由于错误的政治很快便能忽然变成一场灾难,所以我特别想奉行好的政治。此外,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祖国以色列与我们的邻国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中,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我们奉行什么样的政治以避免战争?虽然战争只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的一种错误的政治的结果,但是,这样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为什么重要:它应该促成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

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争执的问题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谈及“一个力求驾驭其丈夫的聪明女人的政治”。我们成年人知道,就是一桩婚姻都难以有一种完美的关系。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像,我们在这里所



谈论的政治要艰难得多:这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政治,是几百万不同的人赖以生存的政治。这么多人的各种愿望当然难以协调一致起来。

所以在政治中总有不相同的意见互相碰撞。对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由于他完全是因为有某种想法才被选举出来任职的,而他的同事们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之间一再有政治纷争。如果来自不同国度的政治家相聚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相异,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复杂。不过他们也必须试图取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尽管如此,政治还是常常失灵的,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在中东,这里的一切无论怎样都比在你们德国那儿复杂。“为什么?”你会问。因为在这

里,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它们在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这样的:它们几乎不容许任何妥协。每一种宗教都深信,它已经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了惟一正确的道路。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信仰开始之时,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这在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过于理智了。

我想,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如果新的千年给予我们的期望从这里能够得到,那么历史将不再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不是用血腥的墨水写成,而是用和平条约的绿色墨水写成。为了可以签署尽可能多的和平条约,我们就需要许多好的政治家。

你会问: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这么说吧:他应该有教养,但尤其应该有好奇心。他不必是他那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譬如为了获得成功,一个司法部长不一定非得是个律师,一个教育部长不一定非得是教师。比这重要得多的是,他善于把聪明的、有才干的同事们组织到自己的工作班子中来。他独自拟定目标,并在最后他自己做出决定,但他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准备,也不是独自一人执行决定。只有当他与那些给他出主意并为他作准备工作的聪明人合作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们面临的任务



是艰巨的。

我们是全体人民的仆人、代言人、使者，在议会里，在政府里，面对别的民族和国家。我知道，我在描述这种责任时，我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在以色列政界工作了五十多年。然而每逢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清楚地知道，这几十年里的政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前，权力还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今天它由群众自己掌握了。无论如何是握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手中了。在这期间，每一个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都装有扩音器。政治家们在大的会议厅里会面，并不是直接地交谈，而是用麦克风互相对话，电视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摄下来。就这样，渐渐地是由电视和新闻媒体在搞政治了。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我们比它们弱，所以需要更多的顾问和专家，以便我们在搞这种政治时能够有发言权。

虽然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渐渐地学会了新的政治才干，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可以忽略：政治正在渐渐地失去影响力。我们只要看看联合国就知道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听起来好听，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仔细一看，聚集在联合国里的国家主要都是这个

世界上的穷国。那么富国的代表呢？他们宁可自己呆在一起，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聚会。

所以谁也不会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看做是全世界的总统。如果说是什么总统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地球上穷国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总统，而绝不是富国的总统。可惜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决定权，那么这便是经济。各大企业集团用它们所做出的决断，规定了世界事务在什么框架内进行。在这方面，连联合国也比不上。

但是，即使政治的影响在消减，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政治。相反，它必须在穷国和富国居间调解；它必须设法使财富得以公正分配；它必



须做出努力，总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同样的机会，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政治家们有多大的差异。在近二百年里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国人拿破仑；一位是印度人甘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拿破仑有惊人的统治才能，但是他首先是一名斗士，所以他会杀人。甘地跟他截然相反。他向世界证明了，人们能够不用暴力来达到重大的政治目

标。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可以看出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拿破仑代表战争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从长远来看，谁会更强烈地影响历史呢？当然是甘地，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人们不应该互相屠杀，而是应该以不使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别人的困难。

所以，甘地这位伟大的和平政治家是我的榜样。如果我的孙儿们问我，他们自己如何才能成为和平政治家，我就会说：“永远睁大你们的眼睛。别被你们所看到的痛苦和灾难吓住了。你们必须使自己明了，大多数人都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他们向后看，不是向前看。但是只有把目光投向未来，人们才能重新安排和改造世界。当然，你们不应该忘记过去，但是你们要有勇气希望得到点什么，你们可以想像这个世界，你们最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为此而经受一切艰难困苦也都是值得的。你们要永远忠于你们的理想，不要因失败和挫折而泄气，不要因绝望和恐惧而气馁。你们要永远像你们自己那样平凡，永远像你们的愿望那样伟大。”

最后我会劝我的孙儿们：“人们有权梦想，就像他们有权吃和喝。让你们的想像力驰骋起来吧，你们不久就会意识到，人们看到、觉察到你们了：‘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一个把目光投向未来的人！’”

（笔录：纳奥米·布比斯）

（摘自《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三联书店 2003 年 3 月版，定价：26.00 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邮编：100010）